

二十年代的萧友梅

萧淑娴

府右街饽饽房八号是座落在府右街路西一个小胡同里的一所住宅。小胡同面对府右街旧皇城西大门。听说在明清时代这所住宅原是太监家属居住的，有内外两重四合院的老北京住宅。父亲原在1918年初购买下来给从广东香山(现为中山市)老宅迁居北京养老的祖父萧公焱翹(又作砚樵名昱增)庶祖母、姑姑、叔叔们十余人居住的。父亲除了担负在粤汉铁路局宿舍自己的家庭(即我母亲及我们五姊妹)之外,还要担负祖父这个大家庭的赡养及各弟妹的教育费,他的责任是够重的。

祖父焱翹公于1919年11月1日故世。这时友梅叔在德早已结束他的学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结束后交通才逐渐恢复方有可能离开欧洲。在回国前,他游历了奥地利、瑞士、意、法、英各国名胜,乘船赴美,拟在回国前,作一次环球旅行。当时因战争故,轮船都不能正期启航,作环球之行更需要时间。不幸的是他到纽约后,因不习惯纽约高楼大厦室内外温度悬殊的生活,由于他在欧战中,因缺煤,室内温度往往很低,生活上不适应得了感冒发高烧,以致因病误了船期,只得又多在美国逗留到下班船。待到回国时正是1920年3月初了。他一到上海便急急乘船赴武昌,会晤阔

别八年的我的父母他的兄嫂,心情的愉快欢畅是可想见到的。尤其是吃了母亲特为他亲手烹调的佳肴美饌,他快乐之极,引起他谈欧战缺食的苦。在波兰避战,住在一所修道庵里,自己种土豆以便有可充饥之粮,至于荤腥则久已不知其味矣。为赴北京教育部报到,他没有久留就北上了。见到兄嫂他才知道祖父已于去年11月1日作古,恰在他旅途中,所以就无从知道家中大事了。二叔到北京教育部报到,决定在北京就职。为了我们姊妹学习问题,父叔商议结果决定了结束我们年龄大的姊妹三人的私塾生活,要我们准备到北京考女子中学。叔叔说我们在家塾读书的中文基础不错,但要准备学数学等课。在二叔北上后,父亲就在我们仍继续古文学习的同时亲自给我们作些加减乘除等数学的练习,也教我们一些英语。

在北京,我家当时住的饽饽房八号,原是内、外两套的四合院。内四合院有上房(即北房,在北京习惯是宅中的最重要的位置,一般是家中长辈才有权住的房屋)、东西两套厢房,内四合院有一道由一个月亮门隔开的南墙,外四合院是包围这内四合院的外围厢房,有南厢房,东厢房及北厢房。大门在东厢房之东南角(也即全住宅的东南角),大门侧是男仆人住房,旁边是厨房,与饭

厅相连，在饭厅与厨房之间，为了冬季用热水方便起见，二叔还特请工人按照他的设计，做了一间沐浴室，靠窗做了一条铁皮长槽并设冷热水龙头，为我们众多姑姪加上二婆（庶祖母）、二叔、材叔及佣人共十多人使用。清晨及晚间入睡时，除了饭厅之外，这里是最热闹的场所。我们住宅房间很充裕，从开始时，我们姊妹住东西厢房，以后母亲又携五妹淑芳、六妹淑庄来北京就读，为了互相照顾方便起见，二婆将北房让给母亲使用，她到外四合院的后院北厢房居住。后院北厢房与内四合院北上房规模相当，但院子小些和没有房前带柱子的走廊。

当时我们姑姪数人，年龄相差无几，先后在北京的国立市立及私立几家著名女中就读。我是自始至终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读书的。那时二叔回国不久便购买了一架钢琴。为了不让我们这群女孩子荒费时光，他亲自教我们姑姪五人钢琴，还将钢琴的使用排了时间表，每人根据各自进度每日进行一或二小时的练习。而他本人除了要去教育部、北京大学讲课、备课、写讲义、搞创作之外，为自己每日也安排两小时的钢琴练习，并且从不间断。二叔在德国留学多年，他的勤学养成非常有条不紊的生活学习及工作习惯，爱惜时间到了分秒必争的程度。在工作和学习的时候，他最讨厌憎恶人们做无谓的事，或游手好闲，浪费光阴，这是他最不能容忍的。

二叔有个特点，在全家人一同就餐时，不仅喜欢滔滔不绝地讲述传闻轶事，还喜欢借就餐时批评家中小辈们。他不骂人，但用些讽刺的言词，使人听起来比挨骂还难受。因为他在用餐时，是他一日间最自我放松的时候。他爱说话，喜欢辩论，往往使一顿晚饭要拖好长的时间。这时二婆是他的最好的应声附和者，不管他说什么，二婆都会随着他的语气而唯唯喏喏的。因此，二婆就成为二

叔最好的知己者，因为老人家整日无他事乐得给二叔做个应声者，这也是她一种消磨时光的方式。

为了避免夏日炎炎的暑热，北京有条件的人家都在四合院中间的院子里搭起用凉蓆和木桩及用竹竿作支柱的凉蓆棚，有利于学习和工作。二叔每年都要找棚匠搭蓆棚，到秋凉就拆去。二叔除了教我们姑姪五人钢琴之外，还请来了一位过去曾在清代末年做过御林军的武术教师张教头，每星期日到家教我们中国武术，如：刀剑棍棒和拳术。二叔和我们先从双棍学起，之后学舞剑及太极拳。二叔见我比妹妹们练习认真，进步很快，定了两把剑，还于剑柄上各刻上友梅和淑娴二字。他原想学剑，以后专习太极拳，而我则练起两把五斤重的剑来。开始习武术时，大家都还认真学习，没有多少时日，她们坚持不下去便停止了，只有二叔和我继续练下去。二叔练太极拳，主要因为他体质不好，练拳健身是有必要的。二叔一直坚持练习太极拳，我不知道他到了上海以后是否因工作过忙也将太极拳放弃了？

二叔在北京大学教学，他讲音乐史和声学，听说来上他课的学生，出于对和声学的好奇竟有千人之众。在1920年秋，我就读旧制中学的4年中，他首先被委聘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建立音乐科。为了聘请教师担任音乐各项科目学习，他网罗人才，请了唐丽莲（母亲可能是美国人，父为华人）教唱歌，这时杨仲子自瑞士回国，他担任钢琴教学，以后刘天华自江苏来京担任琵琶及二胡教学，还有金孟仁教诗词，二叔则教乐理、和声、音乐史等课。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址在石驸马大街，这时男女学生是分校的。音乐科大概是在1921年秋招生，八姑福媛这时在二叔指导下，已经会弹钢琴，于是考入学校音乐科成为第一届音乐科学生。这时易韦斋（南海词人，原和二叔同在临时总统府秘

书处任职的同事)正在北京琉璃厂一家字画书店给人刻图章,他们又在京华相遇,成为知己。易韦斋工词章,二叔此时正需要一位词章合作者,写些为学生唱歌课上需要的,有体现蔡元培主张的德智体美要求的新精神歌词,可培养学生的奋发有为、坚强勇敢精神,这样他可以据之写歌曲配上钢琴伴奏,作为课堂上教唱歌时的应用教材。唐赵丽莲曾在教会学校学习过,又曾在美国留过学,她钢琴弹得很好,自己又能教唱歌,这门合唱课就由她教学生唱,练习好后,由二叔指挥在学期中或学期末开演奏会上作为学习成绩汇报的节目之一。

二叔在北京任教于北大和女高师的教学工作开展之后,他平常的生活,除教学以外的时间都用来撰写讲义和合唱课上的歌曲及钢琴伴奏的写作及创作。虽然他每天为教学工作忙碌,但他从未间断过练琴和打拳,他经常说:“作为一个艺术家,一天不练习,家里人感觉到,三天不练琴,周围的人感觉到,如果一个星期不练习,群众就感觉到了。所以学习音乐和学武术一样,要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的。”

二叔每每将创作好歌曲和伴奏于易韦斋的歌词配上之后,不时地在晚饭后,他弹琴,我们姑姪(主要是八姑、十姑、淑琴三妹、淑贞四妹和我)五人唱他新谱的歌调,这阶段我们家音乐气氛浓郁,琴声歌声四面飞扬。

原在北京大学附设的音乐研究会,1922年改组为附设音乐传习所,所长由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兼,二叔担任教务主任。同时还组织一个管弦乐团,他任乐队指挥,也招收男女学生学习音乐。易韦斋被聘在北大附设的音乐传习所里任教,而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诗词教学则由金国宝担任。易韦斋与二叔友善志同道合,他常来我们家,有时即住在南房西侧的客房里,他写歌词二叔谱曲,他

们合作得很是默契。易韦斋为人喜欢交朋友,非常喜欢我们几个少女,常常拉手拍肩,表示亲热,我们看见他和二叔几乎形影不离,易韦斋又喜欢穿丝袜,有些女性的爱美,淘气调皮的我们几个年龄相当的少女,就开玩笑地叫他“大姑妈”来代替“易伯伯”的称呼了。为了避免住在城里家中,往往有许多来往应酬和吵闹声,扰乱叔叔搞创作时的思维(因为我们家里的姑姪们排着时间表练习钢琴,自早到晚总有练琴声音,是很吵人的),他们在颐和园外,万寿山北面的一个村子里买了一所小房子,只有北屋三间,他们各占北房两侧房作卧室,中间是起居室,那时为了防潮,还安放木板铺地,室外有个小院子,有棵大杏树,小院的西侧有间小厨房,他们请了位住在附近的临时工,白天来给他们打扫房屋,买菜做饭,晚上回家。他们就这样每逢暑假假期就到村中住,一个写诗词,一个谱曲,写好回到城里家中在钢琴上弹奏,要我们姑姪试唱他写的歌。他们合作写成了《今乐初集》、《新歌初集》和《新学制唱歌教科书》等(这些歌集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记得我读中学三年级时,二叔又买了一架小型三角钢琴,是法国迦沃(Gaveau)牌的,为了缓解我们姑姪练琴时间越来越增加,以致影响他创作及练琴的使用。他将琴放在他南房的客厅靠东面板墙旁,墙上面挂着一张贝多芬(Beethoven)放大像,下面中间是萧邦(Chopin)像。他很欣赏萧邦的作品。说他的旋律创作无比精美,变化多采,他还用过雪朋谐音作为别号(也曾译音作索朋)。萧邦像的左边是孙中山先生像,右边是我祖父焱翹公的照片。这些像的两侧挂着一副桂东源写的篆字体对联:“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客厅北面墙上则悬挂着巨幅彩色放大的巴哈(Bach)、莫扎特(Mozart)、舒伯特(Schubert)等他敬仰的音乐大师们的像。他

和我们姑姪还曾轮流坐在三角琴前长凳上摄影留念。

二叔很喜欢社交，秋、冬季在客厅里，夏季在院子的凉棚里，星期六或星期日晚上邀请北大的从欧洲英、德、法（以后也有美国）留过学现在大学任教的教授同事们到家里茶叙，大家在一起做游戏朗诵诗词唱歌或闲谈，这时期的来客中有后来成为我们的姑父的王世杰，还有谭熙鸿、周鲠生、皮砢白、陈西滢（陈源）、杨振声、李四光（仲遂）、赵元任、李步伟夫妇、任鸿隽、陈衡哲夫妇、张奚若、杨景仁夫妇、丁燮林、钱端升、黎锦熙、林风眠、司徒乔等以及我记不得姓名的其他北京知识界当时的知名人物。当然，座上宾还有音乐传习所、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科的师生们和音乐传习所成立的管弦乐队队员们。他搞些社交活动并不花费太大的开销，吃点小点心和糖果及用清茶招待，然而主客们都很高兴心情舒畅，一周工作的疲劳也都随着消除了。大家说说笑笑，或弹首钢琴曲，唱首二叔新写好的或以前写的歌曲、或弹古琴、琵琶、小提琴、中西乐器都可以作为助兴的节目。宾客们可以随兴自由交谈，各得其乐。杨仲子、唐赵丽莲、刘天华、郑颖荪、杜庭修、林风眠（法国留学、画家、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以及女高师第一届的音乐科学生们是常客。这种周末请朋友和大学中师生到家里联欢聚会的社交形式，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德国留学时的大学中社交风尚。他以之代替了中国式的请客上馆子吃饭那种宾主在餐后各散东西的方式，在宾主间感情交流上似乎更有意义得多。

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里，或者是秋高气爽之时，他常和学校里的师生们到郊外或公园及名胜处作春游秋游，还让大家唱他写的歌助兴，这时游园群众围着观看欣赏和师生们同乐。北京当时城里的交通，只有有限的有

轨电车在主要大街上行驶，居民的营运只有人力车，我们那时上学，离学校近的都是步行，路远才乘人力车。像这种整个系的师生春游或秋游，都是靠人力车约定时间地点再集合一起自由参加的。

二叔是个非常优秀的组织者，加上他在德国留学多年，受德国民族特质影响，如：严守纪律、待人忠诚、办事认真负责而又富组织能力，都在他身上发展成为他的天性了。在20年代初期，他负责筹备北大附设音乐传习所和第一次首建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中音乐科，这两处的行政和教学任务，他们的培养目标都是有些区别的，对他们的筹备策划就不是件简单的事。譬如：课程的科目，教学内容，教材和乐器等等都要从头开始，聘请合格能胜任的教师及筹备组织成立一个管弦乐队等工作均非易事。特别是在那个时代想要创办音乐教育事业，这是有史以来的创举，谈何容易？如果不是依靠他将近二十年留日留德的学习积累，尤其是他个人的坚毅勇敢精神和他为振兴中国音乐首先考虑培养人才从音乐教育事业着手，否则他怎能有条不紊地在短短几十年开创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当然，这和他那时延请的音乐教师们同心协力的合作密不可分，这也说明：他善于和同僚合作，能够充分发挥大家的特长有直接关系。他在北京工作这些年都可以表现他对这阶段的成就是比较满意的，心情是舒畅的。我们作为后辈，见到叔父以艰辛的工作达到事业上的成功，为此深受感动并景仰他的作为。

叔父回国时已年满卅六岁了。他也开始注意到婚姻的迫切和必要。虽然有二婆对他的生活起居饮食的照顾，但在家庭生活和社交上有位主妇还是很重要的。在我记忆里曾有人介绍过给他的两位女士，他都不中意。在由他介绍七姑姐和王世杰结婚后，他更有迫切之感。八姑姐是女高师音乐科第一届毕

业生，他最喜欢的是她们班上的袁慧熙。在她们毕业之前，他写过一封求婚信，要八姑姐转交给她。然而，袁慧熙拒绝他的求婚，把信退回给他。二叔对此虽不形于色，然多日不欢。二叔的求婚未能如愿，而中意的女子又这样稀少，他就更加致力于教学、创作和著述，发表了不少的论文，出版了他和易韦斋合作写的歌曲集。袁慧熙的拒绝，虽则二叔克制自己情感的能力很强，但终也瞒不了家里人（当然不是所有人）。我们从练学习武的日常锻炼中，是感觉得到他情绪的变动的。

这里记下一桩他留学柏林时住在一家公寓中一件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有一种似旅馆而又带有家庭生活性质的公寓，外国留学生们大都找这种公寓居住），公寓里每人各有自己的卧室，但每日三餐则集中在一起用膳，价钱比住旅馆便宜，同住在公寓中的各人可以互往来免得孤寂。二叔在这里住时，有一次有位住客，面色黑而暗也前来就餐，他用完饭后退去，二叔这时和邻座的人交谈，他虽非医生但却富于观察力，他告邻座说：“我看这位先生的气色不好，中国人叫做面带乌云，看来他会不久人世的（他用德语说）。”邻座听了，将信将疑，想不到这次用膳的翌日，他的预言竟成为真的事实了，第二天房东告诉住客们，说这位“面带乌云”的客人在那晚用饭后，第二天就因不适送进医院暴卒了！于是 Dr. Hsiao 萧博士就在公寓里出了名（这时他已在莱比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当在1917年欧洲大战之间），也就赢得更多的尊重。这件事给我留下他观察力极强的一个至今未能忘却的遗事一桩。

德国在西欧各发达国家中，人民脱离封建制度是较晚的国家之一。老百姓中对贵族有一种崇拜心理。二叔是很重视自己的祖先来源的。萧氏老家原在江西吉安，父亲就常对我们说，我们是辅佐汉高祖对汉朝的建设曾作最大功绩的萧何之后。我们迁到广东的

远祖是南宋末年曾在那里做过知府迁家居粤的。传到父叔是廿五代了。当二叔给住客们摆家谱时，他还告诉他们说我们的祖先中在南北朝时代的梁朝，在6世纪初做皇帝的有文名的萧统是我们萧氏远祖之一时，他在作客公寓时给他获得了尊重和优待，大家都叫他“Prince Hsiao”，“萧王子”不但受敬重而且在战争时代，食物匮乏紧张情况下，他却享受主人的优待，每早早点得到一小块别人享受不到的牛油！这牛油在当时是稀有之物，二叔身体本来很弱，在学习期间，他又极端勤奋刻苦，体力消耗很重，增加营养是重要的。被称“萧王子”好象很荒唐，但是为了补充体力之不足，又何乐而不为呢？此外还有不少的其他事迹和趣闻，现在也追忆不起来了……

约在1924年间，青年画家司徒乔访候二叔，给他画了一幅坐着弹琴搞创作的油画画像，像有真人大小，二叔身后影影绰绰地画着一个吹笙的仙女，这时正在上初中一年级的六妹淑庄就充当这位吹笙仙女，给她做吹笙的手型，这副画画好后，曾一直悬挂在客厅里，而现在在他的遗物遗书画中，就不见了，何处去了呢？还有待追查。在这时期间记得有一次司徒乔带着从广东到北京想到北大附设音乐传习所所学音乐的冼星海来访问二叔。冼星海谈了很多他的学音乐的志愿，说他想做作曲家，说他的家庭贫苦，母亲以给人洗衣服谋生，又自豪地说德国大作曲家贝多芬的母亲是给贵族作厨娘的，终于他自己成了名闻世界的大作曲家。他说我的母亲是个洗衣妇，我也要像贝多芬那样成为大作曲家（大致的意思，不是原话，事隔六十余年，我已记不清了）……等等。我还记得在这次会晤时，我还给他们俩（一位画家，一位自命为将来的中国贝多芬的未来大作曲家）表演了一次中国武术双剑。司徒乔和冼星海告别后，二叔对我说，这个青年人志气很高，但

有些狂！二叔对所有的喜好学习音乐的年轻人他都是热情帮助的。看到冼星海生活有困难让他在音乐传习所里管理音乐书谱和抄写乐谱，用工作所得补贴他学习生活费用。以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原为美术专科学校，1925年扩改为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增加戏剧系及音乐系。校长林风眠，成立时冼星海就成为音乐系中学生之一了。

1924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第一届音乐科学生毕业了。八姐姐和其他的同学都陆续毕业，有的回原省县从事教学，有的结婚了。二叔送走了第一班同学又着手进行第二班音乐科的学生入学，这一班学生人数比第一届的几乎多一倍。这年正是我从女高师附属女子中学的四年制中学毕业。那年我原想从父命学文学，被女附中保送入女高师为预科生（旧制四年中学，要进大学前，先在预科读一年，以后再分文理科），这时我仍学习钢琴，始终天天练习，二叔太忙，已不教我学琴，改请在音乐科担任钢琴教学的俄籍德人嘉祉（Gaz）教我。二叔说他是大力派，在女高师音乐科中，他和杨仲子分担钢琴课教学任务。嘉祉同时也在北大音乐传习所担任钢琴教学及在乐队中弹奏钢琴，以补传习所附设的管弦乐队因队员不足数，缺少在大型乐曲中所需要声部就以钢琴的声部补其不足。嘉祉的钢琴演奏虽然有他强有力的一面，视谱也快，但他最大的缺点是缺少音乐感，只有力度速度而缺少音乐感人的美。在当时人才极端缺乏的北京，叔叔也只好将就了。杨仲子虽然能教钢琴，他在艺术上是位多才多艺的人物，还写一手漂亮的钟鼎文，经常为人写对联，他也能作曲，写了些歌曲，但很少被演唱也不流行，但他却不能在群众面前弹琴独奏演出。于是只好由嘉祉担任钢琴演出的任务了。二叔除这两位同仁的协助之外，要数唐赵雨莲是他办音乐教育事业最得力的同仁了。她英语极好，能歌能弹

琴，教唱歌、合唱等课。她为人十分热情，在班上的同学们无不喜欢她。二叔的教学方针比较灵活，根据学生特点而定，于某种器乐演奏有突出成绩的，就培养他们为专业演奏者；没有特长的就培养他们为教师，因此师范班之外还有专业培养的做法。他对学生们学习乐器，极力鼓励学生除学钢琴外还要学习一种民间乐器，这时刘天华已自南方来京，二叔聘他担任民间器乐教学。刘天华除二胡拉得非常出色外，还写不少二胡曲，他又精于弹奏琵琶以及其他吹拉弹拨的乐器，可称为民间音乐多面手。他也在北大音乐传习所中担任教学，吴伯超这时是传习所的学生，曾和刘天华学过二胡，谭抒真在传习所里学小提琴，以后两人都先后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副院长之职。我除以钢琴为主科外，还从刘天华先生学习琵琶。

二叔见我学习钢琴勤奋，在读完预科要决定以何种专业为主时，父亲主张我学文科认为将英文读好，将来有较好出路。而二叔则喜欢我以音乐为主，认为我钢琴进步快音乐感好，希望我将来为音乐事业服务。但我本人却非常想学画，因为我自幼即喜欢东涂西抹，在中学时的图画课上，我画的画，不时被老师拿去挂在橱窗里展览，连校长的会客室里也曾悬过我的画。叔父见大家意见不一致，说让命运决定吧，取琴上的拍子机，上面插着三个各写着文学、音乐、美术的纸标签，把拍子机上足了弦，让它在固定的速度上转动，停在哪儿就算命定学哪科，大家都同意了，在拍子机不断地拍打之际，他一面给我们讲西方著名音乐家画家和他知道的文学家故事，一面注视着拍子机停在哪儿，父亲也默默地坐在一旁听着……拍子机终于停了，不歪不斜地停在音乐标签下！叔叔大为高兴，说：“你们看，命运要淑娴学音乐，就决定吧！”我就这样听从命运的摆布以音乐为主科了。

1925年在这阶段的历史是个不平静的一年。首先孙中山先生的逝世,以后是三一八事件、五卅惨案,以及军阀们的互相攻战,影响到学校里的学习。幸而二叔在教学上的严格要求和各教师们的同心同德的协作,乐队队员们的热心合作,学生们学习的认真努力,各方面在他领导下都作出很好的成绩。每个学期末都有一次学生学习成绩的演出,传习所的管弦乐队每年总有约六次节目演出,演奏欧洲各国著名作曲家作品。乐队里缺少的乐器声部则由钢琴声部补充之。这时除了嘉祉之外,二叔也让学生中学习成绩好的,让学生用四手钢琴弹奏。记得我和已毕业的袁慧熙曾四手联弹在乐队中弹奏。因此袁慧熙也常到我们家和我一起弹四手联弹为参加音乐会的演出。袁慧熙也参加二叔组织的在我们家惇惇房凉棚下的音乐会演出,她和我各弹独奏、韩叔华独唱、赵年魁(在乐队中担任小提琴第一把手)小提琴独奏,还有刘天华的二胡琵琶,郑颖荪的古琴也都曾使宾客们大享耳福。在这个时期里,我也曾给教声乐的男中音杜庭修弹伴奏给他教的学生们听他的声乐唱法。

关于二叔对中国乐器改造的想法,除了在他发表过的见诸刊物上的文章外,他还和丁燮林一起研究过如何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竹笛上能够演奏具有转调性能的音阶,譬如增添一些可吹半音的笛孔。因为这是涉及物理学上一些问题的探索,丁燮林很热心地赞助他这个研究。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当时有些愿望而未获实现。记得解放后初期约在1952年左右,我曾有机会见到丁燮林先生,他还提起过这件事呢。当然,改造中国笛子现在已经实现,已比较成功地在独奏笛子乐器上吹奏了。关于国乐改进的意见,叔父在1926年间曾组织了赞助这想法的文化音乐界人士如:蔡元培、刘半农、刘天华、赵元任、杨仲子、赵丽莲、嘉祉及女子大学音乐科学生

们成立了国乐改进社,从1927年开始还办了个《音乐杂志》刊物(第一卷第一期的发刊辞由程朱溪纂)在这刊物上发表过一些名人如:赵元任、刘天华、刘复、萧友梅、缪天瑞等人的文章乐曲等。国乐改进社还进行过音乐会演出等活动。然而,由于北洋政府不重视音乐教育和经常不发全薪,再加上当时的教育部长刘哲停止继续办音乐教学的决定,二叔只有寄希望于南京政府,对于国乐改进社的活动也就无法亲自过问和关心了。

办音乐教育是要一笔经费的。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教育界,经常受到经济的限制难以发展,教师们即便在几所学校兼课,也经常领不到全薪。二叔虽说有三百元的月薪,然而常常只能拿几成,即便兼几所学校课,也仍然是拮据的。这在当时的教育界是很普遍的现象,即使是外国教师也照样拿不到全薪。我记得当我转入女子大学音乐科后,曾从霍尔瓦特夫人学唱,除和班里几位学声乐的同学从她练声习唱之外,还在课外向她学习钢琴表演艺术。为了教声乐,学校正式聘请她到音乐科教我们声乐练习及唱歌这门课。霍尔瓦特夫人以及赵丽莲也和其他中国教师一样每月只拿几成薪水。然而她们的态度都很好,并不因领不到全薪而对教学松懈,她们仍然是照样认真负责,和二叔及其他教师在一起全心全意地负起教学任务的。记得霍尔瓦特夫人曾用英语对我说:“我不是为了几个钱来教你们的,我喜欢你们这些女孩子的才华,愿意为你们服务”。她和赵丽莲一样都有很高尚的情操,不为钱教学,是尊敬的外国艺术家。

可能是在1926年,在一次学年终汇报音乐科成绩,女子大学音乐科全体学生,曾经表演过一次音乐小歌剧名为《五月花后》。那是一出有独唱重唱合唱的小歌剧,是用英文演唱的。谢兰郁和我各担任一个独唱角色,其他则唱合唱。剧情大致是这样:每年五月

群花盛开季节里，一些村镇的姑娘们都要选一位最为大家推崇的姑娘作五月花后，有一位姑娘出身富有，自认为最有资格当选，但群众不喜欢她的高傲，一致认为来自农村的小姑娘品德优美而选了她。霍尔瓦特夫人帮助我们提高独唱表演艺术，赵丽莲负责合唱及全剧的导演工作。在我们排练过程中，二叔经常前来旁听指出缺欠不足，最后在真光电影院举行了公演，由二叔亲自担任舞台监督。公演后，我们音乐科在社会舆论上得到很好的评价及赞赏。当然除了这次表演小歌剧外，我们从刘天华先生学习了琵琶二、三年，对于琵琶已掌握了一定的演奏水平，记得我们全班十六人，有一次全体一起弹了个琵琶合奏节目，有《梅花三弄》及《瀛洲古曲集》中一些乐曲。此外还有其他的钢琴独奏、琵琶独奏等节目。这项演出不仅活跃了当时的北京乐坛，又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二叔在这几年里表现的特点是埋头苦干。他知道也深刻地感到若要振兴音乐以之为发聋振聩，发扬人民高尚勇敢的情操，首要任务是培养出有用的人才。为此他不辞劳苦天天奔波于三处——女子大学、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北大附设音乐传习所……。一方面主持行政事务，一方面亲自担任教学，他教乐理、和声、作曲、音乐史等课，一方面还要给北京唯一的管弦小乐队按期排练，乐队练好了一些节目就在北京大学第二院约可坐三、四百人的小礼堂中举行音乐会。从乐队成立时起到1927年他南下止，这几年间一共举行了约四十余次音乐会。在百忙中，他从未中断过钢琴练习和打太极拳。这些年来他不但写了些较大型的合唱曲、独唱曲，还创作了用五声音阶写的《新霓裳羽衣舞曲》钢琴谱及乐队谱。记得在北大二院首演时，听众第一次听到中国作曲家用民族习惯听的五声音阶创作，亦用西方管弦乐队演奏的乐曲，很受欢迎还轰动一时。

约在1925~26年间，有位哈尔滨的管弦乐队指挥杰什柯维赤(Geschkowitzsch)到北京给俄国歌剧团指挥时，曾听过二叔领导的在北京大学演出一次小管弦乐队的音乐会。他听后认为这是有可能在北京再扩展乐队的的一个基础。当时二叔和这位杰指挥还商量一种发展乐队计划，即从他在哈尔滨的大乐队里聘请二十多人来参加北京的乐队，组成一个大管弦乐队，还向北京市政公所申请拨款，以期赞助这个计划俾得实现。然而交涉结果终成泡影(参阅二叔写的文章《听过上海市政厅大乐音乐会后的感想》其中详谈经过情况)。二叔除了教学培养人才及写作之外，对于提高音乐艺术的普及工作，是只要有机会一向是不遗余力地力争的。

过去，有些人错误地认为，二叔只崇拜西方音乐，而不重视民族音乐，这完全是不公正的。早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哲学系研究音乐学时，他的博士论文就以《关于十七世纪以前中国历代管弦乐队发展的研究》(他又简名之为《中国古代乐器考》)为论题。他为了写这篇论文，在德国图书馆中有关音乐的中文书籍中，摘录了各朝代有关各种乐器的记载，如：性能、尺寸、形状、制作法等等以及各朝代乐队编制、乐师、演奏的重要乐曲等等的笔记，保存在我手中的就有一大厚册(原笔记已交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为萧友梅遗书专设室中保存)。听说吴伯超在二叔故世后曾从我婶母那里取走一大包二叔的音乐作品及一些他在德留学时的笔记等等。吴取走的二叔遗著，我到处向有关人员追询下落，但均无踪迹可寻。吴伯超在解放前夕赴台湾所乘之船与另一轮船于出海口相撞，两轮俱沉海底，全体乘众遇难。如果他随身携去二叔遗作，那就全部毁灭了，这是多么大的遗憾与损失啊！从阅读二叔的笔记中，可知他治学是多么勤奋与有恒。他这篇对中国古代器乐的研究性音乐论文，已由廖辅叔自

德文译为中文，将在上海由上海音乐出版社于今年底前出版。

二叔对于中国民族音乐的提倡，不仅仅在北京三处音乐科系里要求学生在学习西方音乐及乐器的同时，还要求学生们必须学习一种中国民间乐器。每学期、学年终结时，必须将在学期中学好的乐曲，或独奏或合奏在音乐会上演出用以考查优劣，评定成绩。像刘天华及郑颖荪(古琴家)均曾对音乐科的学生作过出色的教学及指导。二叔特别器重刘天华，因为刘先生不仅是琵琶大师，他对二胡以及其他民族乐器均很精通，还创作过多首二胡曲，他不满足于民间乐器音域的局限，又从当时在北京的俄国小提琴家托诺夫(Tonoff)学了小提琴。他是二叔的同事中一位最得力的合作者，和赵丽莲、杨仲子一样在各自教学的岗位上，为了振兴中国现代音乐勤勤恳恳齐心协力地协助二叔主持音乐教育事业共同努力。

不幸的是，在军阀当权时代，艺术不被重视，在刘哲下令取消各学校音乐系，不发经费的形势下，二叔伤心地眼看着多年苦心经营的音乐教学及耗尽精力组织成的管弦小乐队的音乐会演奏事业，都要一一被迫关闭停止工作。他的心情受到严重的创伤。虽则如此，他并不灰心，和当时国民党在南京成立政府的大学学院院长蔡元培商议，在南方建立音乐教育机构。蔡先生对二叔非常器重，对他筹划准备在上海创办一所专为培养音乐艺术教育人才的音乐学院的建议极力支持。在北洋军阀摧残北京各院校音乐教育的形势下，他于1927年初秋间南下到上海，开始他为创立一所音乐院的工作到处奔波。和他一起南下的有位在艺专美术系学习的学生刘开渠，他们在上海同住在《现代评论》社内。刘开渠(前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回忆当年说他那时年轻，看到艺术受摧残，不能在北京继续学美术，听说二叔有南下创办音乐学院的设

想，很想跟他去上海，看看南方有无学习美术的地方。二叔同意和他同行，他就随着叔父到了上海，和二叔一起住在《现代评论》社内。他初次到南方，人生地疏又听不懂南方方言，二叔常常为他翻译和他一起逛马路。二叔是非常喜欢字画的，和他多次谈欧洲绘画美术方面的见闻，使这位当时的青年心中留下了深刻的怀念与感激之情。因此当1982年请他给二叔塑制半身铜像时，他欣然答应了(刘开渠后来赴法学雕塑，解放后曾任杭州美术学院院长及市长，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及美协副主席)。

二叔在赴沪前写过一首歌曲《闻艺专音乐系解散有感》于易韦斋的歌词上，以示他心情之沉重。

二叔当时在北京居住七年间，除了在最初三四年间和易韦斋合作写了数十首为了教学应用的歌曲之外，还编写了风琴、钢琴、小提琴教科书。为初级中学用的乐理教科书和声学纲要(以后在上海出版为《和声学》)以及没有发表的《音乐史》(即《旧乐沿革》)手稿等等。(请参阅台北出版的《萧友梅先生之生平——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之父》一文)。当二叔在1927年夏秋间赴沪筹备在沪实现他的夙愿——创办一所专门培养音乐教育及演奏人才的音乐院而不辞劳苦呕心沥血地惨淡经营他的理想事业时，那时我仍在女子大学音乐系由杨仲子代理系主任作我最后一年的学习。在这阶段里关于二叔如何进行创办音乐院的经过情况，我在北平是不太详知的。只有从他的来信中有时提到的一星半点。信件早已遗失，现在已无从回忆了。最大的遗憾是二叔和父亲彼此间往来频繁的信件，现在一封都没有留下来。以我估计，有可能在日寇占领北平期间为了防备敌伪军的搜查，由父亲亲自销毁。

二叔到了上海之后，曾有一张上海音乐院成立时最早的像片，登在国乐改进社办的

第一期的《音乐杂志》上，这张1927年音乐院成立像片不见登载于台北出版的《萧友海先生之生平》中，那上面登的一张是1928年11月照的，当时我已到沪被聘为上海国立音乐院之钢琴助教，照片上面有十姑婉恂站在后排学生中，按理我应在前排教师中，可能我因事未去参加，没有我的像，而吴伯超却坐在前排，那时吴伯超也是从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毕业到上海音乐院任助教的，可谓遗憾。

下面将记些二叔生活琐事，以见二叔的为人及性格。

二叔是喜欢与朋友同过周末联欢的，也常在过年过节(国庆或什么其他节日暑假期间)时，请各校的师生们到家里茶叙，或奏乐或诵诗讲故事说笑话等活动助兴，凡是现在还活着的师生(也都是耄耋老人了!)们在记忆里都还保留着温馨的回忆(我的老同学以琵琶闻名的曹安和谢兰郁就曾和我追忆过往事，给我以很大帮助)。但他却最不喜欢而且到深恶痛绝程度的厌恶人们在家内打麻将牌或打扑克牌或推牌九之类的中国社会家庭间的娱乐(实际上往往带有赌博性)。二婆年老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她老人家喜欢打打麻将牌消磨时光，她要姑姑们陪她玩牌，当姑姑们无课时就开起麻将牌阵来。哪知道有一次，正巧学校因事无课，二叔回家比平时早，当他走进院中就听到牌战声音，又正好我也在家，他问我：“谁在打牌？是我们家么还是邻居？”我那时不知道二叔最痛恶打牌，而且我认为打打牌对老人家也是一种娱乐消遣，从前我在汉口居住时，有时也陪过我母亲打牌，不以为是坏事，可是这回我却犯了直言不讳的忌，如实地实说了。哪知道二叔竟发起大脾气来，飞跑到后院，推门而入，看见姑姑们(大概是七姑八姑十姑几位)陪着二婆玩麻将牌。二叔平时对待二婆向来亲热尊重，这时他却怒气冲冲不顾一切礼貌，抓起一大把象牙竹牌往火炉里(当时正值隆冬)

一扔，同时大声责备说：“音乐家庭只能有音乐的声音、唱歌读书的声音，怎可以容许打牌声音来玷污音乐家庭的名声呢？！现在我把牌烧了，看你们还打不打！”怒冲冲地责骂一通出去了。他这时火气上升，也不管这样对待老人家是否合宜，都置之度外了。事后，姑姑们对我好一阵的埋怨。事件的发生是我万万没有料到叔父会如此痛恶打牌，否则我何必告以实话获罪于我的长辈呢？

二叔平素生活俭朴，但非常重视卫生。饮食重视营养，而且早就要求每人备有两副筷子用餐，一副用来挟菜，一副自用。他说这样做，剩余的菜留给佣人吃对他们说也是卫生的，不但可避免家中老小间由饮食引起的传染疾病，对佣人来说也是尊重他们的表示。当然，这样做，增加了保姆的劳动，但为了避免互相传染疾病，对于一个大家庭来说还是应该做的。记得这时家里有两个二婆从广东带来的丫环，一个专管做饭，一个管清洁卫生洗衣工作，还有一男听差，姓郭，住在大门旁的房间内，在我家工作多年后告老回乡。老郭为人非常诚实勤恳可靠。冬季北方寒冷，每间厢房都要生个煤炉，北京冬季很长，总有五个月要生煤炉，五六个煤炉的工作量就不少。此外，二叔有些外勤工作，也需要有个男服务员为他奔走。当然，二婆带来的两名婢女到了结婚年龄，就都给她们找个好婆家嫁出去，以后就雇用保姆代替她们的工作。北方保姆做不来广东口味的饭菜，这时二婆不得不负起指导责任，教保姆烹调，好在老人家身体好，又善于烹饪，也乐于以此消磨时光。二叔在世界大战中受过缺食之苦，曾对我们说：“缺食时多么想吃肉。”又说：“如果能打下一只乌鸦来，也将是美味的，可惜连乌鸦肉也没吃着啊！”

在冬季时，二叔住在南房里，日间没有阳光比较冷。他在冬季总是穿件厚棉长袍外罩件布长衫，套上一双袖套，脖子上围条长

毛线织的围脖，头上戴顶毛线帽，坐在他的
大书桌前写讲义、编书籍、作曲、或写投在乐
杂志及报刊上的文章。一般是在晚上九时
以后工作到深夜。春、夏季中二叔喜欢穿西
装，夏天穿白西装，结个蝴蝶似的黑领结，
戴顶草帽，显得很潇洒。指挥乐队开音乐会
时，则穿黑色礼服，完全保留西方乐队指挥
的仪表形象。然而成鲜明对比的是，开音乐
会时，乐队队员则一律穿中式的长袍马褂，
中西服装并存，倒也很协调，并不令人感到
不伦不类。因为他们都在勤勤恳恳努力地
为沟通中西音乐交流服务，使群众（这时的
群众主要以知识界人士为多，并未普及到社
会各阶层）得到高尚的精神享受，体现了蔡
元培当时竭力地提倡美育思想，二叔是以
实际行动体现这个理想的执行者。

和二叔交往很密切的朋友如赵元任夫妇
和李四光夫妇不仅前来参加茶话会，有时也
在我们家用饭。李四光先生是素食的，当母
亲在京时，还特别为他做素食。李四光夫人
许淑彬女士原是我在中学时教我们唱歌的
音乐教师，当我在中学肄业时，每逢中学校里
举行什么纪念会需要全校学生唱国歌校歌时，
许先生往往因要指挥全体学生唱歌，要我
给她弹琴伴奏。李四光先生也能拉小提琴，
还写过一首提琴曲，提请二叔教正，这份手
稿还保存在二叔遗物中。当赵元任先生出版
他那本《赵元任新诗歌集》二叔还写了一篇
介绍文，不仅大大赞美他的写作，誉为中
国写新歌曲的天才，并且还经常要我们始终
唱赵元任的歌由他亲自弹琴给我们伴奏。二
叔不仅爱才重才，还很重视友情，赵元任夫
妇常往来于中国美国之间，只要在中国必然
来看望二叔或二叔去清华大学访候他谈论
音乐的。赵元任夫妇当然也组织过茶话会或
鸡尾酒会（cocktail）邀请二叔及女大音乐系
师生们在他们家欢叙。

此外，任鸿隽和夫人陈衡哲女士也是常

相往来的朋友，任先生和二叔是同时出国去
欧洲留学的。陈衡哲是位女历史学家，她写
过一首诗“爱”，二叔为此诗写过歌及伴奏，
登在《音乐杂志》第一期上。

这里还要补记一笔，孙中山先生故世
时，为了急于需用追悼曲，他将在德留学时
写的悼念烈士黄兴、蔡锷钢琴曲配了乐队曲
谱，并且要我给他抄乐谱，乐谱现尚保存在
南京紫金山上中山灵堂内。北京音乐研究
所齐毓怡为此曾去中山灵堂察访，看到这份
乐谱还妥善地保存着。

1928年秋，我在女子大学音乐系钢琴专
修毕业，受聘于上海国立音乐院为钢琴助
教。那时就住在辣斐德路桃源村，在音乐院
教师宿舍与一位教英文梁老师同住一房，每
日三餐在二叔住处（亦辣斐德路桃源村内）
用膳。二叔与二婆、八姑福媛八姑丈俞诚之
（当时在音乐院中任文书）及十姑婉恂都住
在那幢楼里。音乐院成立才一周，学生人
数不多。二叔对入选的学生是很严格的，对
于有发展为演奏家才能的就收为专修科生，
对于有些音乐才能但不特别突出者则收到
师范班培训。他对外省到沪投考的学生们，
都非常关心爱护，记得陈振铎曾对我说他
那时是个穷学生，生活很困难，这时洗星海
也从北京艺专转到上海音乐院了，二叔照
顾他们俩人，让他们在他那间非常狭窄的办
公室里各摆一张小桌做抄谱工作，使他们
得到抄谱酬劳费，作为生活补助。陈振铎
说起这段往事时，还非常感激二叔对他帮
助的情谊，曾写过篇记，现仍保存我处。

二叔在上海工作那十三年间，是国事最
艰难之时。他的婚姻生活不够美满，二婶
不能在工作上成为他的贤内助，反而使他
的音乐事业，在创作和著述上不能有个安
静场所便利工作。记得八姑福媛对我说过，
二婶是位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二叔是个无
神论者。为了躲避二婶无休止地在耳边劝
说入教，他需

要找个清静地方写书写文章备课，他不得不经常住在八姑家，一住便是二、三周。比较起来他在上海阶段的著述及乐曲创作，远不如在北京那七年间那样多，这不能说不是个遗憾和损失！

1930年我赴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学习。1933年及1934年，我在比国皇家音乐学院先后取得和声二等奖，对位优秀头等奖及赋格曲奖状后，1935年回国，曾在上海江湾新建校舍的国立音乐学院教对位法，因与德国著名乐队指挥家舍尔兴博士(Dr. Heimann Scheichen)有婚约，他特于寒假内来京和我结婚。后来，因婚姻故而不得不离开教学工作，再次出国，致使二叔对我表示他的不满和谴责。幸好后来他在音乐家名人词典中，找到了海曼·舍尔兴的名字和他在音乐乐队指挥艺术上的记载之后，他才转怒为喜，还特将他查到的记载给我抄录下来寄给我说，将来中国安定了，希望他能到中国来帮助我们发展音乐事业作贡献。在这个时代人类正处在有史以来最大的动乱中，芦沟桥激起中国全民族抗日斗争，而1939年欧洲的法西斯则挑起史无前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东西两半球都沦入战火中。我们虽然都属于幸存者，没有被战火消灭，然而生活上的流离颠沛，坎坷艰难，中外人类都同样的身受其害。这就一言难尽了！

* * * * *

叔父于1940年终在上海逝世，距今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年是他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为了怀念我敬爱的叔父，这里断断续续的首尾不连贯的回忆随笔，是追踪自1920年到1927年这七年间，我在北京上中学、大学学习阶段和叔父、庶祖母、几位姑姐及妹妹们住在府右街饽饽房共同生活时，对他的家庭生活、社交往来、著述工作概况的片段回忆。当时我是个学生，每日我有自己的学校学习生活，不可能时时刻刻追随在他身侧，

这里只能将我接触到的事迹，只鳞片爪地追忆一下，是极不全面的。至于他在上海居住那十三年直至他去世这些年间，是他一生内既遂意又艰难，既成功又历经挫折坎坷的一个阶段。说他遂意成功是因为尽管其肇终也简，终于多年宿愿获偿，建成了一所第一个专门学习音乐的上海音乐院，说他颠沛艰难是经历了日寇侵华在炮火连天的岁月里，不得不多次将整所音专大搬迁，加以学校经费无着落曾亲赴武汉企望政府将音专迁移内地未获批准之后又赴香港寻觅经济支助的机会也未获成功，数月的奔波终归落空的挫折失望，终使他本已虚弱的身体，经受不了这么多的磨难挫折，贫病交困，终于一病不起！未能活到解放后，亲眼看到由他亲手建立的上海音乐学院，在党领导下这四十年来蓬勃发展人才济济，欣欣向荣的盛况，是多么深的遗憾啊！

值得庆幸的是，由上海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合编、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萧友梅音乐文集》，闻说今秋即将问世与群众见面了。贺绿汀名誉院长在医院养病之际，为了不误出版时期，还在病榻上执笔写序，深使人感动。廖辅叔先生在去夏酷热之际将萧友梅1917年获得博士学位写的《中国古代乐器考》(德名原为《十七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论文，译为中文，登在这部文集中，这部文集集聚他一生各时期对音乐教育、研究、论著之大成，通过上海音乐学院及音乐研究所负责编辑、整理、校阅的各位同志们的辛劳工作是深深使人感激的。在这部《文集》即将出版之际，我希望有朝一日他的已绝版的和从未出版过的音乐创作或许能得到出版与群众见面的机会？缅怀先贤，这是我作为晚辈所衷心祝愿其能实现的。

1990年6月